

两次全球危机与中国崛起^{*}

布兰德利·沃马克

【内容提要】 2017年以来,世界诸多地区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这在某些方面与2008年有几分相似:在短时间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国际秩序的脆弱性程度,且无法预测不确定性何时结束。随着特朗普胜选,美国再次成为全球危机中心,中国则再次成为世界大国中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与2008年时一样,中国在2017年危机中仍处于相对有利位置。国际关系将在危机结束后发生相对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可能在亚洲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本文旨在探讨两次危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2008年到2014年,各国均对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全球经济走势深感担忧。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成为区域大国和世界经济强国心存戒心。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显得似乎不再自信,而中国则变得更加“强硬”。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2015年以后进入缓慢增长新常态,但是中国领导层得到巩固,并且支持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多边活动。美国领导层战略规划和危机管控能力不断下降,政策方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世界需要中国提振经济,在2017年政治危机面前,世界同样需要中国提供政治信心。就目前而言,美国可能难以适应自身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和中国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一事实。

【关键词】 不确定性 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 中国崛起

【作者简介】 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电子邮箱: brantly@gmail.com

^{*} 在此笔者要感谢广大读者和《国际政治科学》审稿人的评审和建议。本文的较早版本已在河内举行的第五届越南问题国际研讨会,以及中国外交学院、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三十届中国政治学会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发表。本文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徐舟翻译。

现存秩序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前提和假定,当政治或者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这些假定往往会受到深刻考验和质疑,人们开始期待一个结构上与旧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秩序能够产生。国际危机一般肇始于单个或多个国际突发事件,它们往往会动摇人们对于现有秩序的信心(credibility),人们担心秩序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人们在调整预期后逐渐适应全新环境。就像地壳缓慢移动最终形成地震一样,国际结构缓慢变化也可能最终导致国际危机。国际危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人们感到恐慌,人们像担心地震余震一样担心危机余波。尽管危机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但是两种危机的动因和传播速度不尽相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社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现象,情况会很快好转;而另一观点则认为危机只是无止境衰落的开始。10年后来看,显然上述两种极端情况都并未发生,但是这场危机却标志全球经济重组进程的正式开始。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迅速崛起也引发世界各国政治担忧,中国周边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2017年爆发的这场政治危机与美国大选以及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关联密切。尽管这次无人指望经济状况能迅速复苏,但是人们也无法对此次政治危机进行有效评估。因为通过观察股市变化,人们至少可以评估危机严重程度。相比之下,政治危机甚至缺乏有效的衡量指标。人们对当前政治危机充满忧虑,这与其说是担心现行经济或政治秩序的崩溃,不如说是担心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秩序领导者的行为变得难以捉摸。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危机管控、维护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秩序方面都处于关键位置。然而,目前外界对其战略偏好、领导能力以及其执政变数一无所知。此外,世界其他大国应对危机态度也不十分明确,对于未来10年全球政治走向,人们充满疑问。但是,2008年以来的十年经济动荡仍能给当下解决危机提供一些启示。未来难以预测,但是厘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间的相互关系,对我们思考当下大有裨益。

要对2017年政治危机进行全面评估,就必须首先针对特朗普胜选总统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进行维度分析。再次,需要讨论不确定性的持续时间(duration)、它所导致的美国外交变化程度(volatility)以及不同地区和议题上受危机影响的差异(difference)。总之,“特朗普危机”(Trump crisis)反

映了某种国际社会的深刻变迁,这些变迁与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它们或许预示着国际政治全新时代的即将到来。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本文将尝试厘清 2008 年经济危机和 2017 年政治危机的相互关系。首先,两场危机的剧烈程度以及美国卷入的深度均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应对未知风险,所有国家必须转换观念,过去人们习惯于在稳定体系中评估边际风险和收益,现在,人们不得不摒弃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思考如何应对不可预测风险。此外,各国受两场危机冲击程度不尽相同,例如中国在两场危机中损失最少。最后,尽管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是当下政治危机爆发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当前政治危机仍有其特定的政治原因。

两场危机的不同之处也同样引人关注,并且至关重要。首先,2008 年经济危机对当前各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均产生政治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并未动摇各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本身。相比之下,当前的政治危机源于人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普遍疏离,这种趋势即便无法立刻造成现有秩序解体,也会对其构成足够挑战。其次,尽管全球经济在 2017 年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人们依然普遍担心增长放缓“新常态”(new normal)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议题直接与经济问题相关,但是其本身却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受到普遍关注。尽管中国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已经被其他各国普遍接受。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BRI)倡议等诸多举措,也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的强势驱动下,一个开放的亚洲已经重新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中国崛起不再被周边众多国家视作一种威胁,而是当作机遇。正如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长期的政治影响一样,2017 年的政治危机也可能对国际秩序产生长远经济影响。

本文最后两节集中讨论了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同 2008 年一样,中国在此次全球政治危机中受冲击较小。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提前预判和充分准备。尽管如此,此次危机将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对中国的影响仍不容小觑。正如 2008 年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相对获益一样,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也将在本次政治危机后得到明显提升。然而这种提升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大,并且也会产生一定副作用。首先,其他国家可能高估中国的实际能力,这将使得中国在运用软实力和处理非对称国家间关系(asymmetry)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另外,中国也将面临身份认同困境,因为中国同时拥有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使得中国必须同时从 G2(中美两国)和 G193(联合国成员国)^①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当然,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和平统一才是中国在未来 30 年中所要面对的最具挑战性任务,其微妙性使得中国需要谨慎为之。

相比中国,特朗普执政将成为美国应对当前危机时的头号难题。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特朗普的四年执政时间似乎难以忍受,但是弹劾亦会造成国家巨大伤害。就国内政治而言,虽然很难想象 2020 年时特朗普能成功连任,但是美国选举政治无疑将深受其成功选战之路的影响。因为后来之人会尝试效仿,亦步亦趋地踏上权力之路。就国际政治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和危机管控将变得难以预测。其实,抛开特朗普不谈,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府就已经表露出某种“迷恋霸权地位”(nostalgic hegemonism)的倾向,而美国对国际规范所采取的例外主义态度(attitude of exceptionalism)则正是这种心态的具体体现。^②事实上,美国政府只有依托现有可用资源,并对不同政策选项结果做出预判,才能正确行事。如果忽略这点,今后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选项可能将所剩无几。

一、评估 2017 年的政治危机

同历史上的任何拐点一样,我们很难确定当前的政治危机究竟何时开始。尽管 2016 年 6 月的英国脱欧(Brexit)公投已让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存疑。但是,直到特朗普崛起和最终赢得大选,这次危机的真正影响才开始显露端倪;这次危机的本质与其说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或是其各种写入议程并计划实施的方案对全球政治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倒不如说是

① 联合国目前拥有 193 个成员国。

② 笔者提出“迷恋霸主地位”这一概念,想要说明这样一种情形:衰落的霸权国总是沉浸在对权力的记忆中,即使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也不愿承认维持霸权已无可能这一现实。

特朗普执政让美国有成为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中心的危险。尽管特朗普上任不久,但其作为领导人所造成的美国内政与外交不确定性却超越以往任何时期。^①

(一) 特朗普政府多种维度上的“不确定性”

目前,不确定性并非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唯一挑战,同时世界政治所面临的问题也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外交政策所带来不确定性挑战。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各项政策变化剧烈,相互关系错综复杂,这种模糊的政策走向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极不确定性,所有事情都变得难以预期。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种“不确定性”也将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稳定。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对美双边关系;美国盟友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履行同盟承诺;国际社会则对现行国际机制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它已无可争议地运行了70年之久。

至少在五个维度(dimensions)上,特朗普的政治领导力存在不确定性。第一,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在美国政坛中,竞选者在胜选前后出现言行不一致的情况并不稀奇,但特朗普常常以草率而措辞强烈的方式发表自相矛盾的观点,并且经常出尔反尔,这在美国政坛上无出其右者。特朗普的推文经常让其幕僚也感到十分惊讶。^② 特朗普的反复无常的言论也使其政策取向变得难以界定。在对外交往中,他并不在意和对手培养感情,相反,他更偏好于追求最大收益,也就是其所鼓吹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他的这种决策偏好加剧了其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其政策连贯性始终让人怀疑。^③

① Melvyn Leffler, “The Worst First Year of Foreign Policy Ever,”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9, 2017.

② 例如,特朗普反对其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进行谈判的建议,他同样也经常推翻自己过去的主张,例如他曾表示,与金正恩会晤“十分荣幸”。Dmitry Sevastapulo, “Trump Says North Korea Talks Are ‘Waste of Tim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 2017.

③ Donald Trump and Tony Schwartz, *The Art of the Deal* (New York: Warner Press, 1989).

第二,特朗普政策团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包括外交团队在内,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团队均面临成员经验缺乏、专业人手短缺、人选富有争议等各种问题。一方面,特朗普在外交部门人事任命方面反应迟钝。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涉外干部人选大多缺乏专业背景,并且他们还常常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不一。此外,特朗普极不尊重专业意见,其我行我素的风格使得外交和情报部门士气低落。相对外事部门所受到的冷遇,军事机关及相关部门似乎更受总统青睐,但是它们也难以影响总统决策。^① 由于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本身缺陷和政策走向的反复变化,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更易受到总统幕僚间日益公开的矛盾和冲突的影响。^② 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依靠家庭成员意见拍板的习惯还会造成其决策团队与政策执行机构之间的脱节问题。由于特朗普不重视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具体过程,其管理团队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动辄先发制人地解雇那些对其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其团队执行能力也令人怀疑。

第三,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各项政策的全面批判可能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产生不确定性。受选举走向和政府更迭的影响,如何维持政策连续性始终是民主政治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人们对此早有预期,但2017年奥巴马与特朗普在政策问题上分歧过于巨大,加之特朗普重“交易”,不重“关系”的行事风格,美国政府的政策不连贯性有可能表现得比以往更为严重。因此,特朗普之前的各项政策和对外关系极有可能被其本人推倒重来,也有可能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目前难以明确。

第四,特朗普决策时常常带有强烈个人风格,他常常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上反复无常,坚称“自己从未犯错”,甚至否认“存在犯错可能”。^③ 笔者将这种行事风格所带来的风险称之为“认知不确定性”(learning uncertainty)。这种风险的危害在于,当特朗普发现形势有变时,人们很难预

① Julie Hirschfeld Davis and Helene Cooper, "Trump Says Transgender People Will Not Be Allowed in Military,"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7.

② Courtney Weaver and Paul McClain, "Scaramucci Interview Escalates White House Power Struggle," *Financial Times*, July 28, 2017.

③ Brandy X. Lee, *The Dangerous Case of Donald Trump: 27 Psychiatrists and Mental Health Experts Assess a President* (London: Macmillan, 2017).

测他是否会在政策上做出根本改变,或是矢口否认变化存在,这就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严峻。

第五,特朗普与外国领导人发生冲突的不确定性。对特朗普来说,公众形象异常重要,他喜欢与其他领导人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甚至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也常常固执己见(positive spin)。^①这种方式有时会让双方关系剑拔弩张。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特朗普希望树立一个强势、睿智、成功的领导人形象。但是,当他遇到一个同样希望展现自己个人能力和决不妥协风格的对手时,其个人风格则极有可能酿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么选择认输,要么选择妥协,对另一方来说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领导人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从特朗普时不时会冒出“唐突之举”(abrupt move)的行事风格来看,发生冲突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二) 政治危机的持续时间和过程

就美国历史而言,总统换届常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假设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赢得大选,人们也会猜测她将多大程度上改变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方针。问题是,特朗普加剧了上述五个维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相互作用,最终酿成此次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持续危机。从政策导向到具体执行,从政策连贯性到政策调整幅度,乃至决策风格,美国外交各个方面均受质疑。因为上述变化,世界政治中心——美国的未来走向变得充满未知,上述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退,同时这些影响也不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或是彻底消除。特朗普不受前任政府的决策约束;他的团队四分五裂,而非齐心协力;他的个人行事风格让其麻烦不断,问题因此难以解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影响终将消去,在后特朗普时代,新一届政府还将不断调整政策,这将使得国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幅度多大,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尚不得知。

除了上述因素,特朗普的任期变数也可能加剧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

^① James Politi, "Trump's Grand Tour Offers Theatre from Saudi Arabia to Sicily," *Financial Times*, May 26, 2017.

美国总统任期一届四年,目前暂未出现总统任期内被免职的先例。然而,特朗普已年逾七十,据传其经商生涯中常为获利而不择手段,成为总统支持率又持续低迷,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这位总统极有可能任内受到弹劾而下台。尽管不被看好,但是一位资深参议员曾指出,特朗普再干四年也并非绝无可能。^①当然,考虑到特朗普获胜时的微弱优势和目前人气低迷的状态,大选再次获胜似乎希望渺茫。不过历史总有例外,相比2000年时以低票胜选的经历,伊拉克战争后的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便以绝对票数优势连任美国总统。无论如何,有了特朗普的“前车之鉴”,其继任者的政治立场都会变得值得怀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危害可能还将继续影响美国和世界政治。

尽管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治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在某些特定领域里,美国政府行为仍然有迹可循。例如,假设特朗普在2017年4月时曾考虑过针对朝鲜核设施进行打击,但是后来放弃了该想法。那么,在韩国已经选出新总统的情况下,特朗普就不太可能重新考虑动用武力。特朗普之所以决定放弃这一行动,可能是考虑到这一行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且行动本身也难以确保万无一失。另外,就在美国政府犹豫之际,新任韩国总统已经开始对国家实施有效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特朗普只能谨慎行事,这是其放弃动武的另一重要原因。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有可能做出惊人之举,他曾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如果金正恩访问美国,他将感到“十分荣幸”。^②反之,假设朝鲜进一步挑衅美国,特朗普也可能做出过激反应。无论如何,特朗普的决策都将在各个领域开创诸多先例。特朗普将继续不受任何先例束缚,即使这些先例是他自己开创的。当然,这些先例也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潜在政策选项,因为制定新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政策环境。

尽管特朗普不断“开创”(accumulate)美国政治的各种先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一定会遵循自己制定的这些先例,反之,认定美国外交政策将会因为先例积累而趋于稳定则更是一种误判。特朗普经常行事冲动

① Senator Mark Warner of Virginia, referenced in Evan Osnos, “Endgames,” *New Yorker*, May 8, 2017, p. 37.

② Anne Gearan and Ashley Parker, “President Trump Says That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with North Korean Dictator,” *Washington Post*, May 1, 2017.

(impulsive),他渴望向选民展示其宏大的政治愿景,这种想法有可能导致其政策的根本性变化。除此之外,特朗普身边还有诸多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之类的激进顾问相伴。其实,激进派们在制定政策细节上并无过人之处,但是相比其他态度温和的商业顾问和军事顾问的观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特朗普对激进派们描绘的世界末日和终极一战的场景都深信不疑。特朗普很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上摆脱温和派们的束缚,而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这些行为极有可能是源自那些激进顾问们的想法)。谨小慎微的政策无法实现特朗普的宏大目标,这会给他不断带来挫败感,他最终可能在战略层面寻求突破。此外,因为国会的阻挠,特朗普在国内政策上屡屡受挫,这也可能促使其在外交政策中采取更为极端的冒险主义。

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变化幅度仍将受到现实制约:首先,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①中阐述的“美国优先”立场疏远了美国盟友,并且美国单独行动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其次,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美国想要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而又期望不在其他领域产生不可接受的后果,做到这点十分困难。也许,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为美国进行常规战争增添不少底气,但是与另一个国家展开核战争则会增加美国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正如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干涉易,胜利难。特朗普刻意打造自己疯子形象,为达目的而可以不顾一切——这也许符合国际关系中的“疯子理论”——也许疯子本身没有任何禁忌,但其行为依然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

(三) 热点地区和冷点地区

尽管目前全球普遍受到政治危机影响,但是一些地区和国家受波及程度较少,而另一些地区和国家则损失更为严重(hot pots and cold pots),比如中东地区。长期以来,该地区局势持续动荡,2017年的政治危机更是使得和平进程变得更加曲折而复杂。尽管危机本身无法决定中东局势最终走向,但是作为一种重要外部因素,危机使得中东局势频添变数:叙利亚国家命

^① Donald Trump,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运、伊朗政治走向、沙特皇室政权延续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该区域内不同政权类型间相互竞争,同时区域内部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加之外部势力的不断介入,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中东地区冲突将愈演愈烈。

当前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还包括欧洲和南美地区。英国“脱欧”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认同的全面反思。就欧盟而言,内部的人口频繁流动和外来移民问题共同滋生了欧洲本土排外主义情绪。尽管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Emmanuel Macron)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连任德国总理的消息稍稍缓解了人们对于欧洲解体这一最坏结果的恐惧,但是随着边界冲突等问题的持续升温,排外势力已经借由俄乌冲突和移民问题迅速扩张影响,并且其基层组织得到不断壮大。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将处于全面守势。^① 在南美,委内瑞拉前途黯淡。由于政经马车双双失灵,巴西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滑,目前南美地区难以发现其他有潜力的地区领导者。

尽管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地区形势不断恶化,冲突似乎一触即发,但是相较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地区的政治风险仍然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整体良好,这不仅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得益于中国对于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支持。再来看看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为东亚地区发展制造麻烦,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又显示出对朝鲜问题过度关注,美国很大程度上凭借“重返亚太”所获得的地区影响力已大打折扣。此外,面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经济进入类似中国的“新常态”的新情况,中国政府一改传统经济发展思路,不再单纯强调自身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国家的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机遇。

(四) 两次危机与时代分界点: 2017 年的特殊意义

如果我们将2008年和2017年的两场危机视作21世纪人口红利效应的分界点^②,就会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要素在国家实

^① Philip Stevens, “The Lesson of the German Election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8, 2017.

^② Brantly Womack, “Asymmetric Parity: U. S. -China Relations in a Multinodal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6, 2016, pp. 1463-1480.

力中的重要性程度正在不断上升。例如,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从1994年的32.5%上升到2014年的47.6%,^①在当今全球市场篮子中,大约有一半商品是在发达国家之外生产的。中国崛起促进了这一普遍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就是得益于其巨大人口红利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人口红利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仍有着本质区别。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中国崛起并非其真正原因,因为中国崛起主要依靠自身人口结构优势以及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所带来的众多合作机会。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持续创新,投资规模始终保持增长,这些都为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回报。同样,特朗普上台正是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加剧的深刻根源,中国依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此次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崛起已使得全球生产力水平对比发生总体性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实力结构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也可能发生某种改变。

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非2017年政治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是它对所有国家认识政治危机提供了某种背景性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两国商品生产总量已经并驾齐驱,几乎共同占到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中美双边关系不再仅是两国最大关切,它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也显得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开始重新调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秩序的展望,这种观点上的转换将可能直接影响2017年后的国际政治走向。意识到美国新任政府自身定位存在不确定性等诸多问题,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为,就像2008年时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在政治危机之时向前继续迈出大步,在国际政治信誉方面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

2017年爆发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s)使人们产生诸多疑问:这些事件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那么世界政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要知道她在2017年的美国大选中离胜利仅一步之遥)?^②2017年后“黑天鹅”事件还将发生,人们是否可以

① 该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指标》。

② 希拉里·克林顿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普选,但是却未能赢得足够选举团票,这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对其进行预测？全球化道路是否即将迎来巨大转折？我认为，上述现象反映并强化了全球政治危机所塑造的某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与全球化时代下的互联互通紧密联系。第一，全球化已成为问题重重的现实。^① 第二，在国内政治中，国家开始强调引导大众关注信息，而非简单垄断信息，所有政权类型均需遵循这一规律。第三，在国际政治中，政治议题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这将成为后霸权时代^②的普遍现象。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国家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就是体系主导国家强制推行自身价值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诉求的过程，因而对其保有抵触情绪。目前，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观点对错与否，而是思考如何消除全球化所带来的内外不利影响。2008 年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不争事实，选择自我封闭没有出路。尽管如此，社会流动加剧以及共同体身份认同缺失仍然使得各种本土保护主义运动在世界上不断兴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populism）势力的不断壮大就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大众联系方式不断发生变革，在信息时代，通信成本几乎为零，交流更具时效性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不受限制。通过分析受众群体的样本数据，针对有着共同爱好和行为倾向趋同的人群投递精准信息成为可能。尽管因特网的普及和海量资讯生成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但是相比信息获得的便利性和相关性，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于：媒体对于社会事件可以进行实时传播，社会事件瞬间获得海量关注成为可能。在网络时代，个人媒体和政治家们都必须对时事热点保持敏感，并且能够快速形成观点，整合相似立场人群并且形成舆论群体，这将成为他们的必备技能。在这个政治议题竞争“高关注度”的时代，获得“高关注度”比传播信息内容本身更具价值，在这种逻辑之下，犀利、

① Brantly Womack,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 *Pacific Affairs*, Vol. 87, No. 2, 2014, pp. 265-284; Yves Tiberghien, “An Uncertain World: Rising Powers, Systemic Risk,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sponse to Brantly Womack’s ‘China’s Future in a Multinodal World Order’,” *Pacific Affairs*, Vol. 87, No. 2, 2014, pp. 285-293.

② 对“后霸权时代”的讨论，可参见：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4).

新奇的激进观点具有独到优势。正因如此,国内政治危机才会愈演愈烈,因为危机不仅只是源于人们对观点本身的分歧,新媒体对分歧的传播和渲染也必须为当前的政治危机产生负上一定责任。

2017年危机后的第三种明显趋势是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将在后霸权时代长期存在。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他希望美国能从全球冲突中全身而退,降低美国在全球干涉中的损失。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增强美国军事实力,“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于美国来说,适应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政治模式绝非易事,因为这对美国伤害巨大。考虑到美国曾经的霸主地位,这并不奇怪。然而,缺乏一个有战略信誉的世界霸主(credible hegemonic power)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一时难以适应。在后霸权时代里,权力仍然十分重要,但其决定性地位将大打折扣,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将更趋复杂。

二、两次全球危机的相同点

如果说两次全球危机存在根本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均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正常时期,国家和社会个体均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走向。基于上述假定,人们得以对未来进行详细规划。在正常时期,社会个体和国家极少考虑那些不大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对现行计划的不断改进。但是,危机使得所有事情都变得充满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危机更是使得所有人的现在和未来都变得愈发难以确定。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似乎是最不可能的结果:股市崩盘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全面瘫痪;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价格大幅跌落;分析师们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观点让人难以信服。再来看看2016年和2017年:美国每月选情让人堪忧,世界其他地区选举情况也不尽人意,世界政治已然面临巨大挑战。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类似,尽管此次政治危机不大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但是全面复苏似乎也希望渺茫。危机爆发之后,国际政治秩序始终在恢复稳定和全面崩溃之间不断摇摆,由于巨大可能性空间的始终存在,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全面崩溃的场景充满担忧。在这种情形下,稳定大众预期要比小修小补更为重要,有人开始

怀念旧秩序,但是没人确信是否退回过去就可以万事大吉。

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经济全球化已成现实。2017年的全球政治危机则预示一个新的全球政治体系正在诞生。当然,这次全球政治危机对世界各国造成影响的方式不尽相同,各国遭受的损失也有高有低。越南预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气数已尽,不得不反思其对外政策。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受危机影响较为明显,但是按损失比例而言,中国受冲击仍然较小。与此类似,得益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发展的坚实领导,2017年中国受本土保护主义(nativism)影响较小。在对外方面,中国在没有美欧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主动将其合作倡议的影响辐射到其他国家。与中国相反,美国似乎并未意识到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未充分理解当前政治危机对全球政治所造成的影响。也许美国政府以为,只要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有利地位,解决好自身问题,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能继续维持。

持续时间的难以预知也是两次危机的共同特征之一。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危机会持续多久”这样的问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考虑到危机对人们的预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类似“危机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多久”一类的问题似乎更加值得追问。因为,随着危机持续时间不断增加,人们会逐渐适应危机所带来的变化。人们不再对那些危机发生后的变化感到诧异,对危机的过度恐惧感也将逐渐消失。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尽管这次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之久,并且它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学会了适应这些变化,并逐步接受了危机之后的全新模式。

三、两次全球危机的不同点

尽管经济与政治有诸多关联,但是研究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7年政治危机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意义重大。2008年的危机使得政府、家庭乃至个人都被置于巨大不确定性面前。面临相同处境,各国人民均对政府抱有厚望。尽管各国经济形势严峻,但是多数国家国内政治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当然,德国和希腊除外,因为两国在危机之前的便已多有龃龉。2008年到2017年这十

年间,尽管有些国家走向失败,有些国家面临“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但这更多都是由国内政治变化导致,而非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

相比之下,2017年全球经济运行相对稳定,但国内和国际政治却深陷危机。在美国,尽管奥巴马政府成功地带领人民摆脱经济危机阴影,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均出现积极复苏迹象,然而特朗普的当选为美国的未来又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欧洲,尽管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但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才是欧洲各国政局动荡的真正元凶。政治持续波动导致了許多反常政治现象,在法国,左右两翼大党轮流执政的传统已被打破,代表温和派的法国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是法国传统政党体系的“局外之人”。再来看看拉丁美洲,尽管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但是相较之下,其国内政治危机更是让人心忧不已。回首2008年到2016年的这十年时间,除了爆发“颜色革命”的几个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仍然界限明晰,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内问题开始有不断扩大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国际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国际政治秩序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

相比其他国家,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则显得波澜不惊。由于多种原因,在2017年的政治危机中的中国也几乎同样是“一枝独秀”。首先,中国在保持低海外投资规模的同时持续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往来,因此相对其他邻国,中国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小。^①其次,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大量的经济储备以维持高增长率。2008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0%逐渐下降,但是仍然比其他国家运行更为平稳。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②在世界其他国家步履蹒跚之际,中国经济逆势上扬。与直觉相反,尽管2001年到2007年间中国年均增速高于2008年之

①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Managing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in an Era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2, No. 4, 2010, pp. 583-600.

② 有关不对称经济增长的国际政治意义的研究,可参见: Brantly Womack, "Asymmetric Parity: U. S.-China Relations in a Multinodal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6, 2016, pp. 1463-1480.

后的年均增速,但此时其他国家也同样表现良好。2008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改变,全世界只有印度GDP可以与中国比肩,但是如果计入工业增加值(industrial value)数据,印度则仍然落后。^① 反观中国,2001年到2007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为5%到7%,但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蹿升至12%。^②

讽刺的是,中国在2008年危机中相对成功的表现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使得其他国家开始担心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在他们看来,经济方面的成功使得中国开始更加强硬地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采取行动。^③ 中国正在迅速扩张其海外投资,并在随后的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中变得更具对抗性。作为中国硬实力的基础与表现形式——其相对的惩罚与奖励能力——在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吸引和劝说他国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显然中国比过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似乎也比以往更加缺乏吸引力(attraction)和说服力(persuasion)。^④

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与2008年时不同。早在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已经宣布,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温和增长的“新常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数据^⑤,2016年中国工业增长率为6.1%,

① 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指标》。

② 同上。

③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Bjorn Jerden, “The Assertive China Narrative: Why It Is Wrong and How So Many Bought into I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p. 47-88;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the Future Status Quo,”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2, 2015, pp. 115-137.

④ 笔者认为“软实力”包括三个元素:关注度(attention)、吸引力和说服力。关注度指的是其他国家对于行为体的关心程度。吸引力是指其他国家受益于行为体和效仿行为体的程度。说服力是指在施行特定政策时,使其他国家相信与行为体具有共同利益的能力,即“双赢”的能力。相关内容可参见:Brantly Womack, “Dancing Alone: A Hard Look at Soft Power,” *Japan Focus*, November 24, 2005, <http://www.japanfocus.org/-Brantly-Womack/1975>.

⑤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able A4, value added in industry, p. 303.

排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之前。尽管仍处于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排行榜的前端,但中国已不再是一骑绝尘。另一个与2008年形成鲜明反差的地方是,中国经济体量到2017年时已在亚洲处于绝对优势,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就规模、贸易量和对外投资额而言)。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是日本的1.5倍,印度的3.7倍,俄罗斯的5.4倍,东盟的3.6倍^①。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超过了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东盟的总和。^②

2008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瞩目,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忧虑。到2017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使其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东亚经济圈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温和增长的新常态,这有助于稳定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发展轨迹的预期。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让中国变得更富吸引力: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事实上的重要支撑;第二,中国致力于推动多边发展项目与合作,内容广泛。在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政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对其他国家至关重要。

经过最初的观望,中国迅速加入到维护全球秩序的行列中来,对温室气体减排协议的大力支持就是突出案例。2014年11月,在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共同领导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政策得以诞生,它将成为全球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其次,中国也在支持如非洲维和行动等联合国工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地区问题上,中方始终支持伊朗核协议和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six-party talks)。1996年“上海五国”(Shanghai Five)的成立以及随后诞生的上海合作组织(SCO)更是为冷战后的中亚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美国政府还是时不时地会批评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常对美国

① 世界银行数据没有录入马来西亚的美元流通情况,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世界发展指标》。

② 同上。

③ “U. 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ovember 12, 2014,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1/us-china-joint-announcement-climate-change>.

提出的国际倡议持观望态度,但这往往是因为这些倡议往往不利于稳定全球秩序,其本身的合理性就令人怀疑。

总的来说,中国在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的承诺和投入都极具吸引力。在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尤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所提出的系列类似主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加。考虑到这点,亚投行对中国周边诸多邻国和美国众多亲密盟友的巨大吸引力也就不足为奇。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其开放程度让人印象深刻,其参与成员囊括美、日、韩、朝诸国。各种大型项目往往难以获得彻底成功,但中国政府已经促成各国合作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全新基调。^① 2008年时,诸多周边邻国尚在担心沦为“后院”。到2017年时,他们已经“谨慎”接纳中国,并自愿融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亚洲。在2017年7月于乌拉圭举行的拉丁美洲政治学协会会议上,仅有1篇论文标题涉及“日本”,5篇涉及“印度”,6篇涉及“美国”,却有23篇论文标题涉及中国议题,中国影响力可见一斑。^②

其实早在2017年全球政治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上述变化就已经显露端倪,只是危机产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中国繁荣稳定所带来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对危机的深刻反思也坚定了中国寻求国际合作的态度和信心。与唐纳德·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采取了一系列审慎而又连贯的政策。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表现出了政策调适能力,2014年夏季调回HYSY-981型石油钻井平台的决定便是个很好的案例。^③ 目前,至少2017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在佛州举行的庄园会议是十分成功的^④,中美两国领导

① Evelyn Goh, ed., *Rising China's Influence in Developing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Programa: Noveno Congres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 Política (Program of the Ninth Congress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Montevideo, Uruguay, July 25-29, 2017.

③ Alex Vuving, “Did China Blin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7,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id-china-blink-the-south-china-sea-10956? page=3>.

④ Tom Mitchel, “Trump Disaster Averted Is a Success for Beijing,” *Financial Times*, April 10, 2017.

人爆发冲突的可怕场景人们尚难以想象。

正如即使没有危机发生,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也会继续增长一样,即使没有2017年的政治危机,中国的政治威望和软实力也会不断上升。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反差使得中国似乎在极短时间内一跃成为经济强国。2017年的政治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中国政治领导力和威望将快速提高。尽管如此,无论是就经济还是政治而言,世界都已经处于后霸权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并非是在取代美国,但是中国的区域和全球地位都在快速上升,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四、2017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

目前,有人认为特朗普当选和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有利于中国,这种观点是存在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将被迫花费大量精力应对美国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中美互为相互依存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崛起的真实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受危机影响较小,因此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客观上将使中国的全球地位在政治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特别是在亚洲政治地位的相对提高,这与2008年后在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情况类似。但是,中国在政治地位方面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政治危机本身得到解决,而是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新的挑战将不断出现。

中国在应对当下全球政治危机方面比其他大国准备更为充分。如上文所述,美国受危机影响最严重。尽管美国的民主政治“反弹”(rebound)并且拒斥了一系列特朗普的决定,但这已经于事无补,美国在战略机遇和政治信誉方面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欧洲深受认同政治问题困扰,这将使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有着广泛跨国协作性欧洲共同体的信念受到极大动摇。俄罗斯被邻国孤立,印度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结果是其邻国的不断疏远^①,日本渴望

^① Sampa Kundu, "India's ASEAN Approach: Acting East," *The Diplomat*, April 8, 2016.

在全球和区域活动中有所作为,但只是成为行动者,而非成为领导者^①。依靠庞大的经济规模、可靠的政治领导,并且坚持与不同政治体制国家和平共处,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比以往更具吸引力。

考虑到前文所提及的各种优势,假使危机没有发生,中国甚至可能表现更佳。诚然危机将会在短期内造成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但正如中国的经济优势并非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特朗普所带来的政治混乱也并未增强中国政治实力。奥巴马政府阻止英、澳加入亚投行的失败进一步表明,美国即使采取更具协调性、也更富竞争力的外交政策,也难以阻止中国倡议的成功施行。也许,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会像现在这般快速扩张,但是其坚实基础依旧会稳步前进。可以想象,希拉里·克林顿将会像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一样调整政策,接受只能与中国协调合作的现实。^②

尽管中国在此次政治危机中表现得比美国更为坚定而可靠,但是这并无助于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出于对美国政策稳定性的担心,世界其他国家开始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而中国除了必须肩负新的国际责任之外,还不得不妥善处理双边外交关系。进一步讲,这也可能使得未来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即使中国愿意履行国际责任,但就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而言,中国也难以凭一己之力完成,也许与美国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谨慎使用软实力与处理不对称性双边关系

以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例,一系列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不断提升的政治软实力,但软实力是一种十分

^①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4-125; Lowell Dittmer, "Asian Security Alliances: Chinese and Japanese Experiences Compared," *Asian Perspective*, Vol. 38, No. 1, 2014, pp. 1-29.

^② 对于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可参见: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 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微妙的资产。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软实力是指行为体在没有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使别人服从的能力。^①而在软实力是所包含的三种元素当中,除了吸引能力和获得关注的能力外,软实力所包含的最为重要元素是说服能力。说服力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双赢性质的合作框架是某项政策具备说服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即使是在双赢性质的合作当中,不对称关系也会对双方合作产生影响,较弱的一方因为处于合作不利地位,因此常常对于合作风险更加警惕,对于重大变革也更加谨慎。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仅仅依靠政策宣示的方式来强调合作的双赢性质是不够的;中国必须让其合作伙伴相信该项政策比其他政策更加安全也更加有利。考虑到全球政治危机的影响,相对国内政治稳定的中国已经具备一定优势,但这远远不够,它还需要说服其合作伙伴相信,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才是降低风险并且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上上之策。

讽刺的是,尽管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面享有战略信誉,并希望以此作为战略资本来领导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但是要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亚洲国家愿意在全球化时代下选择继续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尽管全球化浪潮使得每个国家的选择都变得多种多样,但是选择改善特定国家间关系通常更具吸引力,例如,自由贸易协定(FTAs)就比其他具有排他性双边关系的协议更具吸引力。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提出建立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的举措在全球化时代下十分受用。^②如果中国要求其合作伙伴在中、美或中、俄间选边站,则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可能会明智地选择避免做出这种承诺,进而放弃合作。它们知道,如果选边站,它们就会失去更多机会,并且丧失外交灵活性。就这点而言,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将更有利于大多数国家保持外交独立性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中国只有确保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也能发展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前提下,它们才会更加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必须是自由的

^①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also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② Georg Strüver, “‘Bereft of Friends’? China’s Rise and Search for Political Partners in South Americ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p. 117-151.

亚洲,也必须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亚洲。

随着中国政治领导力的不断增长,如何妥善处理大量的非对称双边关系也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① 中国可能会试图利用自身经济实力作为重要手段,迫使邻国按照中国意愿行事。中国在“萨德问题”上向韩国施压,要求其停止布置“萨德”(THAAD)导弹防御系统便是案例之一。理论上来说,中国使用不对称优势来应对重大国家安全威胁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大国常常也会过度运用不对称实力来处理其他威胁程度较小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更加迅速而彻底地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不当做法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战略问题。首先,中国邻国众多,他们时刻都在关注中国动向。如果中国向某个邻国持续施压,这些国家就会变得更为谨慎,也更不愿意亲近和依靠中国。其次,由于中国与很多国家存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制定互动规则时,除了强调国家利益原则外,还必须强调公平原则。区别对待行为将削弱中国的战略信誉,破坏中国发展所依靠的国际秩序的走向。

诸多研究表明,大国衰落往往源自于过度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② 考虑到中国发展的特点,中国崛起似乎不大可能成为这一规律的又一牺牲品。然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浓厚,快速崛起所滋生出的大国心态也可能导致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产生某种微妙过度扩张。与此同时,这种傲慢的大国心态也将对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产生负面影响,其典型表现就是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意愿不断减少。某种程度上,这种傲慢心态还可能会让中国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对合作伙伴的利益关切却视而不见,其结果是中国领导国际合作的能力不断减弱。

(二) 国际身份和领域对领导力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定位自身国际身份及与之相应的领导地

^①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位。中国是一个跨地区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的世界大国。由于身份上的多样性,应该选择哪些地区和领域承担领导责任将成为中国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对待同一议题的态度往往不尽相同。例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世界各国可以共同协作,但在其他方面,这些国家就可能剑拔弩张。如果中国选择只在 G2 框架内与美国展开合作,那么其他中小国家就会担心大国意志将会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如果中国选择在 G20 框架内进行国际合作,那么又会在行动力方面陷入困境,尽管这对阐明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大有裨益。

近年来,东盟国家提出一系列合作倡议。从 1994 年东盟牵头形成地区论坛到后来 10+3 合作机制的建立,到目前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各种磋商,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案例。就东盟自身发展而言,区域合作不断加深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东盟在成功吸纳中、日、印等域外大国参与东盟建设的同时,其自身区域领导力也存在边缘化的危险。目前为止,中国始终尊重东盟国家在多边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支持东盟各项倡议。

(三) 实现“伟大复兴”及其困难

在未来 30 年里,中国即将长期面临的最困难挑战将是如何将港澳台地区与大陆整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香港《基本法》的 50 年有效期限将于 2047 年到期,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澳门《基本法》也即将于 2049 年到期,这与香港《基本法》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可以预见,到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目前海峡两岸的状态似乎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这种统一趋势似乎已成定局。因为上述区域并未相互独立出去,也没有任何国家同时给予上述地区外交承认。然而,目前情况与中国的“伟大复兴”仍有一定距离,而且 30 年的时间似乎也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将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过程。首先,这些地区存在着建制差异。港澳台地区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利,台湾地区拥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此外,港澳台三地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以及与大陆关系也各有不同。尽管三地都是中国组成部分,并且其中的两个已经成为中国特

别行政区,但是如何在保证地方自治权利的同时兼顾顶层设计,这一元宪法难题(metaconstitutional problem)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顶层设计已经殊为不易,而将其付诸实践则更是难上加难。

也许,随着中国政治声誉不断提高,整合情况将会变得更为乐观,因为按照目前形势发展,统一将被视作大势所趋。随着 2047 年的临近,中国政府势必采取更为明确的举措,这极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也许,让不同地区学会更多地互相尊重,才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

总体来说,中国的政治声誉和国际影响力都在全球政治危机当中迅速提升,前景相当光明。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在 2008 年还是 2017 年,中国的迅速崛起都非源自美国的失败,而是归功于中国自身的发展。2008 年中国经济稳定,2017 年的政治发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两次危机发生,中国各项数据绝对值(absolute term)也许会表现更好。然而,中国已从两场危机中获益众多。

五、2017 年后美国的发展前景

如果说 2008 年经济危机对美国造成了一定冲击,那么,2017 年的政治危机则似乎让美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美国未来前景更加暗淡。2008 年,经济危机在小布什任期的最后六个月里突然开始显现威力,而当时仍未上任的奥巴马团队已开始准备应对之策。美国 GDP 在 2009 年时下降了 3%,但在 2010 年恢复了 3%,从 2008 年到 2014 年总体增长了 8%。尽管如此,美国的工业增加值仍然表现不佳,2009 年下降了 6%,2014 年则表现为略低于 2007 年的水平,^①到 2016 年底,美国国内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恢复。然而,美国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一) 特朗普上台及其影响

就目前而言(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这场政治危机所导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危机已经对世界造成了多大伤害,而是它未来还将造成多大伤害,以及

^① 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6 世界发展指标》。

这种伤害持续时间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恐惧。特朗普执政已经导致了美国国内的持续动荡,自身难保的美国政府已经难以让世界其他国家相信自己的意图和采取行动的承诺。面对当前困局,人们也似乎丝毫看不到改善的迹象,对于解决问题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人们似乎一筹莫展。尽管特朗普当选总统还未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是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一片哗然。我们也很难想象任何国际有识之士会对其当选后的美国持乐观态度。

如上所述,特朗普政府在常规外交和危机管理方面的举措难以预测,加之美国国内存在的其他问题,美国政治表现出极大不确定性,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的行为饱受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媒体的广泛批评,面对美国的各种提议和政策,世界各国开始变得犹豫不决,与美国合作意愿不断减弱。美国政府引领世界舆论的能力因此大为削弱。

(二) 对世界霸权的迷恋及其代价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因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而备受批评,他的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不断衰落的美国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①事实上,艾利森并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只是推断:在中国持续崛起、美国担心失去霸主地位的恐惧以及两国存在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极大。艾利森深受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这些观点认为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过渡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②但是就美中关系而言,尽管两国经济规模大致相同(显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两国所拥有的能力及所处环境却大相径庭。^③在任何时候,中美两国都难以保持绝对的对等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必须通过“挑战”来解决的利益冲突。而且,身处这样一个后霸权时代,那种传统格局中的绝对权力制高点似乎也并不存在,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获得和失去,更谈不上为之一战。

①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②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③ Brantly Womack, "Asymmetric Parity: U. S. -China Relations in a Multinodal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6, 2016, pp. 1463-1480.

尽管如此,“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的盛行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美国仍在持续增长,但相对而言,其增长的重要性和绝对性意义都在下降。在心态上则体现为美国对于世界霸权的迷恋(hegemonic nostalgia);不愿调整心态以适应权力和影响力下降的新现实。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一样,美国也可能会对过去的黄金时代和国际声誉进行理想化的叙事和想象,并对衰落的结果忧心忡忡。特朗普所呼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这种心态的最佳体现。

美国对世界霸权的迷恋心态所导致的直接政策后果是低估权力转移程度,表现形式则是为挽回失去的国际领导权所进行的失败尝试。较早期的例子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时期的英、法两国的干预——这是冷战时期两国对于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最后挑战。就当下而言,奥巴马阻止英、澳、韩等国加入亚投行的失败努力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曾经的领导国往往难以调整心态以平和地适应目前的战略守势阶段。相反,它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只要表现得更为强硬(assertiveness),形势就会改观。许多美国人将国内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的巨大体量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威胁。然而,美国没有能力扭转历史或阻止中国崛起。事实上,美国只是摆出一副敌视中国并时刻准备与之对抗的姿态,而这只能吸引那些对美国霸权抱有幻想的大众眼球。而专家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与中国对抗的代价巨大,且徒劳无益。^① 尽管如此,艾利森对冲突可能性的关切仍不失为智识之见。

(三) 相对确定性: 美国外交的选项和资源

虽然历史不能逆转,但是美国的衰落也绝非简单线性下降。美国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特朗普和中国都无法改变这些基本事实。据普华永道(PWC)预测,到2050年,美国将是世界五大经济体中

^① Michael Swain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2015*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 James Dobbins et al., *Conflict with China Revisited: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248.html>.

唯一的发达国家,也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① 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无论在任何领域,美国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世界大战,则难以想象劫后余生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基于现有的实力地位,美国仍有能力修正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政策错误。如果世界大战是唯一可能致命的错误,那么美国的合作伙伴就应谨慎行事,只要存在可能就不应排除合作的希望,美国也是如此。鉴于中美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认识这点至关重要。

六、结论:政治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外交政策

就一般情况而言,政策建议通常先假设或描述某种政策框架,然后给定政策选项,并且建议某种具体的行动方案。但是,在处于极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之下,决策者的决策方法和程序都必须发生相应改变,所有备选方案都必须基于推测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contingent and hypothetical)。笔者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提出某种适用于不可预测条件下的原则和态度,而不仅仅是提出某项具体的行动计划。笔者主张,在应对当前全球政治危机时我们应当坚持这样一种总体方针和原则,它包括四个方面:保持冷静、相互包容、强调问题导向而非对抗导向以及构建区域和全球机制(global regime)。

首先,人们应该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尽管人们在危机局势中难以做到这点,但这无疑是上上之策。危机激发了人们对于各种极端可能性的想象,尽管它们极少应验。过度的情绪波动是冷静思考和采取适当行动的大敌。在危机发生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危机可能的波及范围以及危机可能产生影响大小。因此,保持冷静十分必要,这并不是因为危机很快就会结束,而是因为危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项原则是相互包容,这在后霸权时代尤为重要。要做到这点,各国就应该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给自己留有余地,并且学会包容对手,因为他们也

^① Price Waterhouse, *The World in 2050*, February, 2015,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future-economy.html>.

可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即使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哪怕对方最后拒绝善意,也应坚持这种包容态度。有趣的是,美国也曾有向苏东地区提供与西欧地区的马歇尔计划类似的经济援助方案,但却遭到拒绝。事实上,这是美国外交活动的成功之处,我们只是说,如果苏联接受援助,那将达到更好的外交效果。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都是减少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但是伙伴关系是两者之中更好的选择,因为前者更具包容性。

第三项原则是减少对抗,多关注具体问题。在媒体的煽动怂恿下,国家领导人决策时往往会将国家利益冲突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并且摆出一副全面对抗的姿态。事实上,一方获胜而另一方宣告失败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以国家领导人之间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之争绝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结果,这只能增强双方的对抗倾向,延长对抗时间。相反,通过强调讨论具体问题而非进行对抗,双方仍然能够表达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通过引入专业意见,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有机会区分利益上的分歧与民族自尊和对立所产生的情绪波动。

最后一项原则是建立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所有国家都希望在后霸权世界中保持稳定预期,而建立广泛的多边体系和制度则是达成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人们最初设计出来这些以降低关税等形式出现的制度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它们最基本的功能是确认所有机制参与者的正式地位以及设置各种博弈规则。就此而言,东盟在区域组织建设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是制度化效用的最好例子(不考虑这些具体制度内容的话)。具有可信度的国际机构一旦建立,机构成员就会开始不断增加,制度的具体内容也就可能逐步改进。

上述四项原则将会使外交变得更为审慎,在国际关系不稳定时期,这些一般性准则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危机使得人们容易采取过激行为,例如联合起来对抗可能出现的威胁,“得意扬扬”地等待挑战出现(stand up proudly against challenger)。人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反应,不是因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保持这种强硬态度,就可以应对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各种危害。要知道,如果这种不确定性真实存在,那么否认其存在就是最不恰当的回答。尽管感情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人们应当努力保持政策灵活性,并且努力通过合作来减少未知所可能产生的混乱与恐惧,也许这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为适当的举动。